

附錄二、梁肅戎先生訪談摘要

訪問、記錄：吳欣哲

時間：2003 年 6 月 11 日上午 10:00~12:30

地點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4 樓，和平國際法律事務所

受訪者簡介：

梁肅戎先生，1920 年生於中國遼寧省昌圖縣。新京法政大學法學部畢業(1941)、日本明治大學大學院法學博士(1976)。1941 年滿洲國司法科高等官考試及格，後任滿洲國檢察官，同時進行抗日地下情報工作。戰後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。來台後，曾為雷震及彭明敏擔任辯護律師。曾任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、秘書長，常負責與黨外人士溝通。1989 年當選立法院副院長。1990 年擔任立法院長，1991 年底退職。現任律師。

訪談摘要：

1944 年，依《治安維持法》，判 12 年。我早期在坐監（1 年半）之後，想寫一些詳細經過，但因戰爭勝利而打亂了。我是依《大學令》第 1 屆畢業於「新京法政大學」。滿洲國沒有綜合大學，只有單科大學，如：新京法大、新京工大、新京醫大、獸醫大學、師範學院、奉天蒙大；大同學院則是訓練機構。法大的前身是「司法部法學校」。

日本對東北是的確是侵略，但有一部分日本青年想在當地開創「新天地」，其中許多人考入「大同學院」。大同學院 1932 年就成立，它主要是訓練日本人統治滿洲的幹部，第一屆學生來自日本各大學的畢業生。其中有些是左傾人士。

日本明治維新之後，現代化進程很快。明治維新時，日本派留學生出國，一批是官方的、一批是民間的（中國則全是官方派出的）。民間出去的留學生，回國後不當官，而創立許多私立大學，並從事自由民權運動。日本有官方亦有民間留學生，乃是其維新成功的主因。日本成功後，本應提攜亞洲鄰邦，卻不此之圖，而效法歐美列強「霸道」侵略亞洲。併吞了韓國，也使中國遭受嚴重的損害。日俄戰爭，日本打敗俄國，繼承了俄國在東北的既得利權，如旅順大連租借地、南滿鐵路，在鐵路附屬地內，設

學校、警察．．．等等。後來就搞了九一八事變。

一、求學經過

日本侵略東北的方法很厲害，先設法學校，並把日本的司法制度拿到東北，司法省派參事官設計司法制度。法學校是 3 年制，招收高中畢業生。3 年之中，全為軍事化管理，週六才許離開學校。法學校畢業生，不經考試，即派任司法官。可是到我這屆，由於《大學令》實施，法學校改為法大，畢業生必須通過高考，才能當司法官。法大學生各民族都有，但教授主要是日本人，沒有中文訓練。我從中學開始學日文。東北學制，原本是初中 3 年、高中 3 年，大學 1 年預科、3 年本科，滿洲國學制後來改為 4 年制「國民高等學校」（簡稱「國高」，內含初中、高中）。我從 3 年制初中畢業後，考高中落第了，在家裡休息 1 年。後來「國民高等學校」制度實施，我們 3 年制初中畢業生，可以直接考「國高」4 年級。我法大 1939 年入學，1941 畢業（3 年制）。我畢業後，法大改為 4 年制。

法大分為兩個學部，一為「法學部」，一為「經濟學部」，是滿洲國唯一政法學校。另外有「建國大學」，不是根據《大學令》設立，6 年制（前期 3 年、後期 3 年），政治性很強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。法大則還有些學術氣氛，我們的教授很多是「自由派」學者，例如留德「新派」柚木馨（民法權威），日本國內大學被「舊派」所掌握，他進不去，所以到新京法大任法學部長，他在日本國可謂獨樹一幟，對債編、物權編很有研究。之前的法學校，則是調了一批年輕日本司法官來任教，以建立「司法公平制度」。所以，東北和（日治時期的）台灣一樣，人民對司法絕對信賴，司法官絕不貪污，操守是一流的，把日本司法文化帶東北。

二、滿洲國的刑事立法

早期沒有法制，對抗日人士「臨陣格殺」，不經審判就殺人。例如：安東教育界抗日事件，日本人就處死了很多抗日人士。等到我成長後的年代（1940 年代），各種法律就公布了。像《治安維持法》，是刑法的特別法。滿洲國法院是「四級三審」，區法院、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。輕微案件的一審，歸區法院管轄。但《治安維持法》案件，則是「一審一覆」確定，由高等法院「特別治安庭」為事實審理，台灣以前的《懲治叛亂條例》也是由高等法院管轄一審。中華民國的法律，很多是由日本專家協助制定的，我明治的大學的老師，很多有參加 1929 年國民政府新法的制定，兩國同屬「大陸法系」，法律用語也近似，所以後來滿洲國在法制接軌上沒什麼問題，至於親屬繼承事項，日本還是尊重中國的慣習。《治

安維持法》很厲害，只有幾條，對叛亂行為的「參加」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「幹部」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當時我是依《治安維持法》的程序，在新京高等法院被判刑。

三、戰後在台灣推動刑訴修正

戰後台灣刑事訴訟法修正，我出力很多。我對威權政府沒有法治觀念的作風，大力批判。刑訴修正中，我強力主張「偵查中得選任辯護人」，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政策委員會秘書長任內，使之列入修正案，也努力推動立法院修法，後來終於加入刑訴規定，徹底改善了「刑訊」（刑求）的問題。陳立夫「CC派」及陳誠「青年團」，雖然政治上對立，但就刑訴的改革，則有共識，對台灣人權法治作出貢獻。戰前日本刑訴也有這個問題，日本戰後就加入「偵查中得選任辯護人」規定。

四、台灣人的中國印象

日本貫徹法治的精神，很值得我們學習。台灣有些人不喜歡中國，我認為原因有二：第一、對清朝割讓台灣的不諒解；第二、對日本的現代化、法治化相當景仰，對中國的落後混亂感到失望。在東北，日本人統治的法治也很徹底。

五、從地下抗日工作的經過

當時在東北，國民黨、共產黨都有抗日活動。我加入了國民黨從事地下抗日工作。

美國的博士教育比較鬆散，很容易拿到學位，日本的博士教育是在養成教書的人才，不容易拿學位，不會造成「博士滿街跑」而找不到職業，不像中國、美國那樣，有些人拿博士是爲了當官。日本人攻博士，都是立志在教學的。法大畢業那年，柚木教授欣賞我，選我和另一位孫同學（大連人）到京都大學進修。當時我是日文「語學檢定」一等合格的，不僅能說日語，也能讀日文的古文。我本來答應要去，但國民黨上級要我留在東北抗日，並且要去考高考當檢察官，可以指揮憲警，對抗日工作有幫助，所以我只好放棄到京都大學大學院的入學機會。

後來我高考及格，入了大同學院，成爲檢察官。我後來也成爲國民黨「長春市黨部」書記長（相當於「主任委員」），是國民黨在新京（長春）市負責人。我在長春發展了 80 個基本同志，都是我的同學。1944 年 3 月

27 日，在檢察官任內，我因抗日而被逮捕。王光逖（司馬桑敦，後為聯合報駐日特派員），是我們一起因抗日而坐牢。我們以長春的一間照像材料店作為總部，我們的電台則在哈爾濱，被捕前一週的 3 月 20 日左右，哈爾濱的省黨部書記長及委員要來長春集會，結果沒有到，我們才知道哈爾濱機關被日本憲兵隊抓到了。當晚 7 點左右，一位同志來我家通知：長春的總部被憲警包圍起來了！我要她打電報到吉林，要那邊的同志別來長春。由於名單被查獲，且當時日本特務網非常嚴密，我後來終於被抓到了。偽滿體制下，警察要逮捕一般人很容易，但若要逮捕現任司法官，法律規定，要有具體證據，且要高等檢察廳檢察官親自下手令才可以。這個程序走了一個禮拜才完成。雖然我是中國人，偽滿仍然遵守程序規定。被捕之後，在起訴之前，我的薪水照拿；起訴了，停職；判決有罪了，免職。非經過這個程序不可。偽滿統治下，東北中國人吃高粱，日本人才能吃白米（大米）。根據經濟法規，中國人吃白米被發現，要受處罰。中國人考上高考，則可以得到和日本人一樣的配給，如白米、魚、肉、蝦、酒等。訊問我的特務，是一位日本人警佐，階級比我低。五月節我家裡配給了半打啤酒，他才配給 1 瓶，他知道後就說：「你把那些酒拿來一起喝，好不好？」還發牢騷：「你是中國人，我是日本人，你配給 6 瓶，我才 1 瓶，你還抗日？」我說：「這不一樣，你們侵佔我的國家呀！」一直到 1 年以後，我才判刑、免職，之前我家照樣得到配給。他們制度貫徹得很。

六、滿洲國的「法治」

滿洲國說起來，一般日本人及行政機關很跋扈，但司法機關不一樣。日本人書記官，對我這種司法官（高等官）非常尊敬、不得干預。這是很了不起的制度。當時法院院長是中國人，次長是日本人，檢察廳也是這樣。1937 年日本治外法權撤廢，在滿洲的日本人也要受滿洲國司法機關管轄。而且日本司法官有些人被徵去當兵，我身為檢察官，照樣可以偵辦日本人犯罪案件。

偽滿的司法警察，有一般警察、鐵道警察、憲兵、日本憲兵等，偵查犯罪時，都統一由檢察官指揮，我那時候真是很神氣。當時有一位法官（吳國振）是我同學，後來也來到台灣當律師。他曾經很感慨地對我說：「老梁啊，真是奇怪，滿洲國是假的，法律是真的；中華民國是真的，法律是假的！」他說滿洲國是假的國家，可是官兒是真的、法律是真的；中華民國的當官的不像個官、不受尊重，法律亂七八糟又隨便解釋。這個形容是有點過分了，但說得很厲害。滿洲國當然是殖民統治，但它法律制度搞得很嚴謹。所以我覺得，日本人殖民統治最成功的地方，是「法治化」。

七、滿洲國的司法考試

我是大同學院 14 期的學生。大同學院旨在訓練高考及格者成為「大東亞指導者」，學生不分日本人、中國人，一視同仁。還派人到華北及汪政權。大同學院到日本投降為止，共辦了 20 期。我那屆新京法大考上高考的有 11 個，去日本留學回來的紛紛落榜，只 1 個京都大學畢業的考上，柚木馨很是神氣。偽滿高等考試，在日本有 8 個試場，在滿洲只有 3 個：長春（新京）、瀋陽（奉天）、哈爾濱。考官以日本大學的教授為主，所以答題必須要用日文。日本在滿洲把教育及法制掐得很緊。

八、滿洲國的司法、治安、獄政

筆者提問：滿洲國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干涉情況如何？

梁先生答：絕對沒有。但政治犯是例外，由警察局「特高科」（特別高等警察）「思想室」，法院則有「思想廳」。

大同學院全 20 期，畢業的總共約 2 千人（日本人為多，中國人很少）。戰後很多人都當了日本的大臣。崔圭夏（15 期）當了韓國大統領，有的人當了韓國總理。我在台灣從事對日工作相當順利，就是得力於大同學院的人脈。

筆者提問：以您的親身經驗，滿洲國時期，東北的一般治安情況如何？

梁先生答：早期有遊擊隊，軍警抓到就直接處死。一般的治安情形還好。到末期則有經濟統制。當時新京有一個日本警察，被走私大車隊的中國人綁在電線桿上勒死，這其中或有抗日的成分存在。當時這可不得了。事後警察把經過的人都抓了起來。那時候我當「學習法官」（高等官候補），被告是屈打成招，我為被告擔任公設辯護人，審判長是中國人，最後判無罪。雖是日本人被勒死，但法官敢依證據不足而判無罪，法院也不會特別分案給日本人法官。可見司法絕對公正。那個案件，檢察官上訴之後，也是分案給中國人法官。

當時法院有中國法官也有日本法官，分案給誰就是誰，不會特別指定。只有「思想廳」必須用日本人法官，例如審判我的法官。1945 年 5 月起訴我，宣判那天，在新京南嶺的司法大廈，有幾百人在場，包括高級將領也到場旁聽。5 個人被判了死刑，我被判了 12 年徒刑。

「特高」警察對思想犯常會動用刑訊。我被羈押在「特高科」時，有一位大川檢察官來問我有何意見。我告訴他，我身為檢察官，卻違犯了國家法律，該如何處罰我，我無話可說，但絕對不可以對我進行人格侮辱。大川於是警告日本特務，他每幾天就會來探視，不可以刑訊我，我因而免於刑訊之苦。我大同學院的同學，友澤宗一郎檢察官，在我被移送監獄，他得知看守動手揍我，於是警告看守不得再犯，因而救了我。他還常到我家探望我家人，使得在監視我家的日本憲兵頗客氣，不敢亂來。

飯守重任（曾為司法部參事官，參與制定滿洲國司法制度），是我高考時的考官，也是我在司法官訓練所的老師，這個人非常有名。他的兄長是田中耕太郎，曾任日本最高裁判所所長及國際法庭庭長。飯守戰後被蘇軍俘虜，在蘇聯勞改 10 年，後又送到中國撫順監獄，又住了 10 年。回日本後，任東京地裁庭長，後任鹿兒島地裁所長。我到日本留學時又見到他，是我的恩師。他由於是我的老師，所以沒有參與審判我的案件，但我在監獄時，很受到他的幫忙，破例讓我在庭長室和我母親及妻子見面。飯守過世時，我曾為他守靈。

本來我是長春市黨部的書記長，是《治安維持法》所謂的「幹部」，得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我向法庭辯解說，我尚未接到黨中央派令，並不知情，所以只是「加入」的身分而不是「幹部」，法院採納了，所以只判我十二年，否則，起碼是無期徒刑。其他有五人被判了死刑。這時，我以日語向審判長發言：「你們日本人對我們維護國家民族的抗日分子判死刑，是不人道的。我要求審判長將我改判無期徒刑，同時將五人的死刑也改判無期徒刑。」後面的日本憲兵拿起刀子要砍我，但被審判長制止了，場面一時相當混亂。我的抗日工作，並不算立大功、也不是和日本人打仗，然而，身為一個日本人所訓練出的檢察官，竟挺身抗日，實在帶給日本人很大的震撼。在長春震撼了關東軍、在東京震撼了日本皇室，他們沒想到竟有人敢在偽滿首都抗日。

筆者提問：請問滿洲國的監獄管理情形如何？

梁先生答：情形很壞。長春有一座很大的監獄。有一區專關政治犯，二層樓，看守二十四小時監視。該區原本是獨房，但因人滿為患，我和滿鐵的具島兼三郎（因反對日德義三國結盟而入獄）關在同一間牢房。有個姓田中的看守最壞，每天早上來查房，要囚犯在門口站著，他把囚犯的雜物亂翻一通，臨走再給兩巴掌、踢一腳。我剛進去就被看守揍一頓，因為他知道我是檢察官，原來是指揮他們的。囚犯的伙食，中國人吃高粱米，上層全是黑的，是蒼蠅糞，日本人是大米、小米與黃豆摻在一起吃，比中

國人好些。囚房沒有抽水馬桶，只有一個加蓋的木製馬桶。快過年，我家裡送來一隻雞，肉全被看守吃了，到我手上只剩骨頭。

勝利前夕，我在獄中得了一種「回歸熱」，是傳染病，獄中一次死了十幾二十個人。由於我畢竟只是有期徒刑囚犯，獄方不願意我死在獄中，於是把我送到外面醫院治療，逃過一劫，不久之後就光復了。

